

·信札整理·

曾国藩、李鸿章、洪汝奎等致张文虎函札

王 媛 整理

国家图书馆藏有稿本《洪汝奎等书札》一册,收有曾国藩、李鸿章、洪汝奎等晚清名士所致张文虎信函若干通。其中多涉及《史记》、《三国志》、《文选》等典籍的校勘、刻印以及当时学风诸问题,对于我们了解相关的情节颇有资料价值。兹予整理并加必要说明。

收信人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一字啸山,号天目山樵,江苏南汇人,由诸生保举训导。曾任曾国藩的幕僚,又受李鸿章之聘,参与管理江南官书局。先后校刻《守山阁丛书》和《小万卷楼丛书》,世称善本。其校勘《史记》最见功底。著有《舒艺室杂著》、《舒艺室随笔》、《古今乐律考》、《春秋朔闰考》、《湖楼校书记》等。

—

啸山、端甫^①尊兄阁下:三月初六日接到手书,具承垂注,至为感纫。《史记》十表尚未刊就,又有四、五卷须重刻者,自难迅速竣工。鄙意但求警校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校勘记若在十卷以外,便恐伤繁,能再求简约,一洗汉学家好多好详之习,乃为尽善,过多则阅者反厌苦矣。陈作梅^②北上时,“四史”能否竣工?鄙人曾属令携带十馀部,届时如《三国志》尚未刻成,即请先印三史寄来亦可。《文选》^③近已发写,此外即刻。《读书杂志》甚佳,鄙意尤好其《汉书》一种,若刻成以附新刻《汉书》之后,亦快事也。他如汲古阁《五代史》、抚本郑注《礼记》,亦在可刻之列。《庄子》流传多俗本,或刻一精本,专用郭注及陆释文,亦令阅者廓然。此外随时斟酌,经费亦且罄矣。直隶吏治极坏,国藩到任以后,思欲稍图振作,日从事于刀笔筐篋,清兴因之大减。此间读书能文之士甚少,意欲勤加访求,一畅

①端甫,即唐仁寿(1829—1876)。字端甫,号镜香,清海宁人。为曾国藩招致金陵书局,他与张文虎都是金陵书局的重要人物。

②陈作梅:浙江嘉善人,字燮原,号雪园。与李鸿章、郭筠仙、帅远燁被曾国藩誉为“丁未四君子”。

③曾国藩批校《文选》六十卷,清乾隆三十七年叶氏海录轩刻朱墨套印本。

宏奖之风,藉挽衰靡之俗,然求如在江南时与诸君子往还考论文史,牖我愚蒙,匡我不逮,则邈然不可复得耳。肃颂著安,诸惟心鉴不具。

愚弟曾国藩顿首三月廿五日

在局诸兄均此致候

按:此函未注明年份。函中曾国藩提及就任于直隶情形,明此函应作于同治七年(1868)曾调任直隶总督以后。

张文虎同治二年(1863)应曾国藩之邀赴皖,翌年至南京,入金陵书局,校勘《史记》诸书长达十年,一直与曾国藩有直接联系。张文虎在其日记中,对此情形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如同治八年六月四日(1869年7月12日)之日记:“(端甫)又示湘乡公回书,命校刊王石臞《读书杂志》。”^①即是关于张、唐与曾国藩之间一次书信往来经过的完整记录。结合本函中所云“史记十表尚未刊就”事及《张文虎日记》有关十表校刊进展的记录,可知本函正是曾国藩对张、唐同治八年正月间来信的回复。其时,张文虎、唐仁寿协力负责《史记》校刊事,故曾国藩回函亦致以“嘯山、端甫尊兄阁下”。

据《泾舟老人洪琴西先生年谱》,金陵书局《三国志》刊成于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②,由是亦明曾国藩函乃作于此前的同治八年,即1869年5月6日。

二

嘯山、端甫尊兄阁下:本月初四日接到手书,具悉嘯山兄以六月初还抵金陵,即维台候绥愉,纂述日富,至为跂佩。《史记》十表陆续付刊,重写各卷,亦俱上板,《两汉书》将次修竣,现已刷样覆校,《三国志》已刊全,未修。马、班、范、陈四史能于九月刷十餘部解北,则天津未冻以前可到,至盼至盼。《文选》刻已过半,惟刻手佳者不能招徕,即校勘诸友亦未能广为延聘,皆缘经费过少,遂致成书迟延。书局之设金陵,实为诸路之倡。目下各省纷纷开局,并皆奏用公费,而金陵至今尚未筹一有着之款,亦未派有提调专员,是以局务仍形散漫,鄙人致书毅帅^③曾言此后须另筹一款,俾薪水用项与苏、浙不甚悬殊,并商派洪琴西太守^④提调局务以专责成。琴西经

①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

②《泾舟老人洪琴西先生年谱》“(同治九年)正月,书局中《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工毕。《三国志》亦刊成。”见陈祖武选:《晚清名儒年谱》第九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2月,第304页。

③毅帅:马新贻(1821-1870),字毅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授安徽知县。咸丰间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擢按察使,以失庐州革职。同治初,从复庐州,历按察使、布政使,旋调任浙江巡抚。七年,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被张汶祥刺杀。谥端愍。

④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湖北汉阳人。道光年间举人。咸丰十年为知县,之后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等人幕府。同治初,荐保至江南道员,总理粮台。

理此事,最为精熟,现已入局,诸事当有起色。穀帅来函,亦拟另筹经费,此后便成一件官事,井井有条,即成书,亦可冀迅速矣。《史记》旧少善本,此次会合诸家,斟酌体例,当可度越诸本。即成功稍迟,自不必以局外之讥评介意也。直隶二麦歉收,季夏雨水霑足,方冀秋收中稔,乃七月以后未得一雨,黍稷又被旱灾,惟天、河、宣、永四属尚称有年,余则收数不及五成,且有并不足三成者,凋残之余,复值饥岁,嗷魂遍野,无术绥辑,官事亦无可施展,皆由疆吏奉职无状,殃及黔黎,焦虑曷任。知注并及复颂台安不具。

愚弟曾国藩顿首八月十七日

按:此函未注明年份。据张文虎同治八年九月初六日(1869年10月10日)日记:“接曾侯保定信八月十七日发,知直隶二麦歉收,秋又旱灾,惟天、河、宣、永尚称有年,余则收数不及五成,且有不足三成者。”^①此即曾国藩函中所云诸事,明此函作于同治八年。

曾函中云:“《史记》旧少善本,此次会合诸家,斟酌体例,当可度越诸本。即成功稍迟,自不必以局外之讥评介意也。”校刊《史记》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二诸侯年表》复校完成时,张文虎在日记中写道:“校《十二诸侯年表》竟。《史记》向无善本,而此表舛误脱落尤多,上下前后两格相连,往往互属,各本或异或同,皆归窜乱,中有与纪、传、世家同误者,固史公记载之疏,其他传、世家不误而表误者,则明是转写失真。钱氏《考异》、王氏《杂志》于此表辩证,寥寥无几条,惟梁氏《志疑》最为详析,而亦间有疏失。”“古书本难校,而莫难于《史记》。搜罗旧本,博取群书,采诸家辩论,而平心折衷之,勿持意见,勿惑妄言,集数贤之精力,积十年之功,博方通人,就正有道,然后勒为一篇,或于史公可告无罪。然而欲彻底通晓,毫无疑滞,亦不能也。今也旋校旋写,旋写旋刊,区区以两人之心力,而出之以急就。予老而衰,端甫又多病,如此虽二三前辈恐亦不能任也。”^②张校本《史记》,世称善本,盖得益于其与唐仁寿根据钱吉泰的校本和其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时本加以考订,择善而从。作为金陵书局的筹办者和直接领导,曾国藩“但求警校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的态度与主张,给予了苦心校雠的张、唐二人很大支持,也为这部善本的问世创造了有利条件。函云“商派洪琴西太守提调局务以专责成”事,《泾舟老人洪琴西先生年谱》记载:“(同治八年)六月,马端敏公设书局提调,以先生任其事。局设于冶山飞霞阁。”《张文虎日记》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九日(1869年8月6日)亦记:“洪琴西来拜。时以涂阎仙将卸江宁事,节相命提调书局也。”^③

制定章程是书局大事。同治四年金陵书局成立之初,张文虎所拟书局章程获得李鸿章的批准,从此金陵书局正式开始运转。《张文虎日记》同治四年六

①《张文虎日记》,第192页。

②《张文虎日记》,第106页。

③《张文虎日记》,第186页。

月二十四日(1865年8月15日)记此事:“周缦老自李宫保处来,言所拟章程皆如议。”^①洪汝奎入局后,也首先对书局章程进行了修订。张文虎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1869年8月30日)日记:“拟书局章程十四条。”七月二十四日云:“访洪琴翁,以书局章程示之。”^②至于修订后章程的内容,《泾舟老人洪琴西先生年谱》记载:“先生乃禀承曾文正公,定书局章程八条,又训手民四条。”^③

洪琴西提调金陵书局讫于光绪六年(1880年)。据《泾舟老人洪琴西先生年谱》记载,洪琴西于光绪六年奉上谕调任广东盐运使和两淮节度使,“先生知朝命不可辞,乃于二十日上谒忠诚公请派员接办各差,并请盘库。……程雨亭太守接管书局提调事务,太守旋署扬州府范月槎观察接办书局。”^④自同治八年接任书局提调至此,前后十二载。《泾舟老人洪琴西先生年谱》云:“先生自己已年接办书局提调以来,将局中分认《史》、《汉》等史,并随时奉敕刊刻经子各书,次第刊成。其行世较稀之书,另筹捐款刊印,不动书局正款。历经照章办理,凡十有二年。”^⑤

三

嘯山尊兄閣下:別忽數載,想望殊殷,四月間由章牧帶到惠緘,敬悉一一,即審著述,亦因履祺增吉為頌。寄示《史記》校勘記展閱數過,于正訛同異之間,援引確凿,參訂審詳,大足津逮後學,執事與端甫洵龍門功臣也。文正師未及著論,徵序于仆,奚敢以不文辭,謹擬就另紙錄寄,請削正轉付剞劂為幸。刊成時乞轉告琴西同年,將有札記之《史記》初印本賜寄五六部,尤深感謝。執事宏才宿望,在局最久,正資董率,遽思引去,諒兩帥維繫情殷,必不允行也。此間近狀如恒,麥秋尚稔,匆匆泐復,即頌著祺,統維朗照不具。附序文一紙。

愚弟期李鴻章頓首

按:本函未署明時間。但函中提及“文正師未及著論,徵序于仆”事,是知李鴻章此函應作于同治十一年二月五日曾國藩(謚文正)故世之後。據張文虎日記,張曾于同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1871年12月8日)“謁湘鄉,請作《史記》序”^⑥,概因曾國藩未能于生前完成,張文虎遂以作序事再請于李鴻章。

函中所云“有札記之《史記》初印本”,即指金陵書局《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該本竣工于同治九年。由于金陵書局此校本是參酌眾本,擇善而從,所以張文虎另寫了《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五卷,說明用以互校的各本異文和取去理由。張文虎同治十年十月十三日日記:“校、養清《史記》校記。”

①《張文虎日記》,第53頁。

②《張文虎日記》,第188頁。

③《晚清名儒年譜》第九冊,第303頁。

④⑤《晚清名儒年譜》第九冊,第331頁。

⑥《張文虎日記》,第263頁。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重订《史记》校记。”亦几经核校，终完刻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作序事自应在此稍前，李鸿章此函亦应作于本年。

四

嘯翁先生大人閣下：客冬辱荷惠緘，以俗冗致稽，裁會久抱歉忱。頃復接奉賜函，備承注飾，慚感交并。敬審頤養春和，撰述日富，慰愜頌私。局書自運庫停撥經費後，僅續成南北朝各史及《史記集解》。近又翻雕岳“五經”至周秦諸子，久議校刊，緣局款不充，未敢輕於從事。承示唐府所藏《管子》兩善本，已向唐世兄索觀，正好留為校樣之用。張仁翁處曾托抄瞿府宋本，尚未寄下。《內經》王注^①容俟集費捐辦。近日刻匠頑劣，動手輒不能如意，加以經費短絀，往往有初鮮終。古書刊傳之多寡遲速，殆非偶然。《史記集解》刻下尚未校竣，開刷時即將初印本寄呈左右也。《毛詩傳箋》亦未印行，遠辱垂詢，並以奉聞。《舒藝室隨筆》售價已遵命轉贈唐世兄收存矣。汝奎筦庫羈身，終日冗擾，無可告嘉。肅復敬請著安。諸惟惠照不具。

小弟洪汝奎叩首 四月廿一日

按：本函未注明年份。函中“僅續成南北朝各史及《史記集解》”云云，事在同治十一年（1872）。續成南北朝各史事，可征之于《涇舟老人洪琴西先生年譜》同治十一年記載：“是年，書局南北史、《宋書》、《魏書》、《陳書》皆刊成。”^②函中所提“史記集解”，蓋指金陵書局校刻《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完刻于同治十一年。函文起首云：“客冬辱荷惠緘”，“頃復接奉賜函”等語，又提及向唐世兄（即唐仁壽）索觀《管子》善本事，由此推知，洪琴西本函應作于同治十二年冬張文虎以衰老辭歸之後，光緒二年唐仁壽亡故之前。

函云其時由於資金不足，未及刊行雕岳五經及周秦諸子事，據洪琴西年譜記載：（光緒二年）“書局仿刻宋岳氏相台本五經成。”^③

五

嘯山先生大人閣下：頃奉惠緘，感蒙遠注，臨風三復跂仰良深。就審餐衛沖和，撰著日富，慰如所頌。書局新刊《史記》，今春始行出書，惟刻手甚劣，殊不愜意。局中久缺撥款，未敢議多刻書籍。去歲議刊《元和郡縣》、《元豐九域》、《太平寰宇》三書，嗣僅以《九域志》^④丛刻，餘尚未動工，無米為炊，時時捉襟露肘。友朋捐刻之書，又以弟俗冗異常，無暇理料，不免束閣，內疚殊深。茲檢出宣料紙《史記》一部、書目一冊，交貴友龔君帶呈，

①指唐人王冰注《黃帝內經素問》。

②《晚清名儒年譜》第九冊，第307頁。

③《晚清名儒年譜》第九冊，第320頁。

④國家圖書館藏有金陵書局光緒8年（1882）刊《元豐九域志》。

祈督存。梅翁^①清健犹昔。廉翁仍主讲凤池^②。补麓世兄体素羸弱,近复善病,亦时作时辍,惟文笔颇有长进,拟明春旋浙应试。手此奉复,敬请道安。

小弟洪汝奎顿首

按:本函未注明时间。函中云“去岁议刊《元和郡县》、《元丰九域》、《太平寰宇》三书,嗣仅以《九域志》丛刻,余尚未动工”等事,据《泾舟老人洪琴西先生年谱》,金陵书局议刻《元和郡县》等书在光绪六年(1880):“书局议校刊《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又议刊《元和姓纂》。”^③由是知本函乃作于光绪七年(1881年)。

函中所及补麓,系唐仁寿(端甫)独子。唐仁寿光绪二年故世时,洪琴西将补麓留教于家中。《泾舟老人洪琴西先生年谱》记此事云:“先生与莫善徵明府为刊之时,海宁唐端甫明经亦逝于书局。先生经纪其丧,并留教其孤子补麓,与诸子同学焉。”^④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梅翁,指汪士铎(1802-1889),清江苏江宁人,字振庵,别字梅村,晚号梅翁、无不梅翁。道光二十年举人。所撰《乙丙日记》,述太平天国典制,颇具史料价值。晚年授国子监助教衔。学术初以三礼为主,作《礼服记》等。后治舆地,补赵一清、戴震注《水经注》,释以当时地名。另有《南北史补志》、《汉志志疑》、《江宁府志》及《汪梅村诗文集》等。

②张裕钊(183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1871年,张裕钊应聘主讲江宁凤池书院。

③《晚清名儒年谱》第九册,第329页。

④《晚清名儒年谱》第九册,第320页。